

# 聚焦练兵备战的火热生活

■焦凡洪

##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战争文学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战争对抗的艺术表现。和平时期,少了战争进程的直接对抗,这就为现实题材军事文学的创作带来极大的难度。

现实题材军事文学要想打开新局面,就必须围绕军队的主责主业下功夫。首要的,就是浓墨重彩地书写战争准备的过程。只有聚焦军队的主责主业,讴歌官兵的战斗精神,展现练兵备战的生活魅力,新时代军事文学的自身特色才会彰显,发展路径才会拓宽。

军队从来为打仗,军人生来为打赢,打仗与准备打仗构成了我军恒久的使命任务。所以,我军永远是一支听党指挥的战斗队。然而,当战场的硝烟散去之后,在一些官兵的眼中,敌人已经无踪无影,枪上的瞄准镜里只剩了太平的光景。于是思战与忘战、研战与厌战、常备与懈怠、武备与无备等,就成了处于和平环境的军队永远要面临的矛盾问题,这关乎着军队和国家的命运,也是文学需要呼唤和直面的重大课题。因此,描写和平背景下军人的生存状态和备战状态,就是军事文学创作的生命活力所在。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军的工作重心回归,主业职能回归,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成为全军将士的共同追求与实践。备战打仗的激情使得火

热的军营生活如冰河开裂般汹涌澎湃,这更为军事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和美学素质。军事文学创作应当及时而鲜活地反映军事斗争准备的生活状态,挖掘其中的思想意蕴、文化底蕴和战斗情韵,在增强独特魅力中提升自身的审美价值。

备战打仗的练兵实践也是以科学军事思想和先进军事理论为指导的,军事生活的精彩离不开理论的武装、思想的引领。实事求是地讲,一些现实题材军事文学作品对于这种思想智慧欠缺之充分的自觉,亦缺少艺术的表达,这甚至成了制约军事文学创作质量提升的一个短板。主题的僵硬、理念的直露,使作品的意旨空泛;军事谋略的贫瘠、军事智慧的浅薄,令作品的思想苍白。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与战争准备是一种高端的政治艺术,那些革命战争文学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对我党我军精妙的战争战略艺术和战场战斗艺术的精描细写。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我军的改革带来了军事理论的巨大变革,它在吸纳传统兵学文化精髓、传承革命战争红色基因的基础上,着眼未来战争要求,推出了一批战争理论、战役理论、战术理论的新成果,新的战法、训法也应运而生。在这些智慧转化为战力的过程中,必然要冲破固有思维观念的定势和改变固有军事生活的惯性,使军事理论在军事实践的砥砺中绽放光芒。军事文学作品应当把这种军事斗争准备实践的思想魅力表现出来,把练兵打仗的战略战术表达出来,呈现出当代中国的兵学文化

之美。

在和平年代里,军队的前进步伐既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同向,又有着自身的行为规范。备战意识的自省、临战状态的自律,决定了军队练兵备战的生活具有典型性,而这种典型性是在历史和社会的经纬中凸显的。备战打仗过程中最需要克服“和平积弊”,官兵要永远保持战斗员的本色也绝非易事。把平时当战时,将岗位作战位,在模拟的战场上体验未来战争,他们磨砺的不光是手中武器,还有精神利剑。他们需要战胜的对手不仅是敌人,还有自我。这就使得练兵备战的生活充满了有别于战争形态的繁复和驳杂。因此,军事文学创作不应就训练而写训练,就演习而写演习,使文学的场域促狭;更不能将严肃的军事生活“游戏化”“娱乐化”,使文学的旨趣庸俗化。它应以政治的、社会的视角解读战场上的硝烟,在历史的纵深处反映练兵备战生活的厚重,鞭辟入里地揭示现实矛盾斗争的实质,全方位地透视当代军营壮阔的战斗图景。

军营的主人公是广大官兵,军事生活的战斗魅力在于军人精神世界的雄浑壮丽。进入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开放性、自由性、舒适性程度越来越高,它与军营备战打仗生活的封闭性、紧张性、艰苦性的反差越来越大,这就注定了当代军人自踏上军旅的那一刻起,就要风雨兼程,接受前所未有的洗礼与考验。他们的思想将跨越艰难的高程,心灵将走过复杂的旅程,这种精神的“行军”是长期的,充满着艰难险阻。

当代官兵需要在各种社会思潮、价

值判断的交汇和激荡中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核心价值和职业操守,这就要求军事文学创作的笔触既要潜入部队演兵场的前沿,更要深入指战员的内心,展现军人对美好精神和生活的向往,在表现练兵备战的滚滚洪流中揭示官兵的心灵世界和成长历程,塑造好新时代军人的崭新形象。

战争是锻造历史英雄的熔炉,练兵备战的生活同样是培育新时代英雄的沃土。现代战争的信息化,要求必须实现军事人员的现代化。我军的改革不仅进行了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的整体性、革命性重塑,而且创新了培塑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的体制机制,营造了实现军事人员现代化的良好环境。在如火如荼的军事斗争准备中,一批前瞻型军事理论人才、尖端型军事科技人才、复合型指挥人才、智能型参谋人才、精英型作战人才等脱颖而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标准要求。这就为我军的战斗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在备战打仗实践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具有了崭新风貌。

过去,为了战争胜利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军人是可歌可泣的。今天,为了胜战在改革中浴火重生的军人同样值得大书特书,关键是文学作品要表现出英雄人物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军事文学进行创作理念、创作方法的“升级换代”。以新思维探知军事生活的新质地,以新语境讲述中国军人的新故事,以新手法塑造当代官兵的新形象;通过对练兵备战生活的“正面强攻”,展现我军向实现强军目标而奋勇进击的时代风采。

在构筑的丰满充盈的人性和精神世界渐渐被抽空,灵魂与情感越难以寄托。如何构建自己的文化和精神,我们仍然需要审视一下其实从未离开过我们的传统文化。因此,《刀兵过》对儒、道、释的表现,是一次关于传统文化的深情回眸,是关于人类精神世界的一次艰难探问。

《刀兵过》塑造了乡贤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人物形象。无疑,朱克笙、朱明鹤两代人也是九里的灵魂,他们先后遭遇了九次刀兵过和三四次不是刀兵胜似刀兵的冲击,他们的精神气度和坚韧性格也一再得以彰显和完善。他们写下《九里村约》《陋奴堂纪略》《御倭九戒》,设立《彰善》《记过》两簿,办书院,建万柳塘,立“九里义渡”村碑,为仁义之士立牌坊。对乡贤形象的生动塑造、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度探寻,立起了作品的思想高度。

《刀兵过》充满了文化韵味。老藤擅长在小说中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与神韵。《刀兵过》将众多传统文化载体和符号艺术性地转换成多个意象闪耀于文本之中,使作品变得典雅而清隽。估衣街、陋奴堂、三圣祠、万柳塘、九里村碑、玉虚观、白鹤书院……这些文化实物景观,伴随着故事的推进和发展,既是故事发生的场景或背景,也成了内蕴丰富的意象。作者对传统文化,如四书五经、儒道释、医道、茶道等都有较深厚扎实的研究,无论是议论还是描写,都充满了文雅的气韵。

作品里还有多处谈论道家、儒家的段落,语言精致典雅,既富有知性之美,也成为小说结构的关键节点。比如,克笙是听了吴志甫对祁门茶的精辟谈论才对他有兴趣,才有了后来的拜师和跟随其闯荡东北,才有了故事的开端;如,朱家祖先命运的起伏都直接和朱家医道有关系;克笙开辟九里依靠医术打下根基;在叙述克笙和明鹤应对数次刀兵过的故事起承转合中,针灸砭石发挥了重要的叙事功能。老藤重视传统文化描写,是一种寻求价值、观照心灵的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写应该既是一种文化记忆,也是一种审美想象和体验,更是一种自觉的价值重构和珍贵的诗意栖居。

边关冷月(中国画)

李兵作

长征

第4498期

## 新作聚焦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堪称近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13年来,李洱没拿出作品,以至于人们几乎快要忘记他发表《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时的荣光。13年中,他变成了一个周到活跃的文学组织者、深受欢迎的活动嘉宾,甚至是批评家。他依然妙趣横生,侃侃而谈;但是只有在《应物兄》出版之后,我们才会明白这13年里他有多么沉默。在他的嘴皮子滔滔不绝地吞吐时,有一个世界始终在他的脑海深处盘旋酝酿。他必须在喧哗与内默之间寻找平衡,寻找彼此沟通的办法,让喧哗不至于毁掉内默,相反成为它的滋养。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应物兄》证明李洱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证明,恐怕唯有这样的撕扯、挣扎与平衡,才正合这部小说,适合他所要表现的题材。

《应物兄》被认为是一部学院小说,讲的是知识分子的故事。依照常理,故事似乎应该局限在大学的围墙之内。但正如李洱创作这部小说时的状态一样,围墙外躲不掉的万丈红尘和围墙内本应有的静默沉潜之间,构成了剧烈的对话和互通,从而让情节不断延展,使细节持续丰富。小说的生活幅面从大学的一间办公室出发,走向更为辽阔驳杂的时间和空间。尤为出色的是,李洱将诸多空间密切地联络起来,把空间的迁移编织进时间的逻辑或非逻辑关系中。因而不同的空间会彼此侵入、交叠、渗透,然后把事与人都变得面目全非。正是依靠这样精巧而娴熟的空间操作技术,李洱将一个其实叙事速度相当缓慢的小说讲得花团锦簇、悬念迭起。就像《红楼梦》一样,《应物兄》所讲述的故事的确是在围墙之内,但是又无远弗届,指涉着整个世界。

与空间的广阔相比,《应物兄》所书写的时空跨度其实相当狭窄。小说的开头,积雪尚未化去;小说的结尾,雪花再次飘飞。在85万字的篇幅里,小说讲述的不过是一年之内的故事。但这绝不意味着《应物兄》因此而缺乏历史的纵深。在我看来,《应物兄》中的历史感较之它的空间技术,还要更为出色。不少论者将《应物兄》与《儒林外史》和《围城》相提并论,但两者所书写的不过是特定时代的知识分子,《应物兄》则至少写出了三代知识分子。从改革开放初期走过来的应物兄、文德能、芸娘等是一种面貌;应物兄的学生易艺艺、孟昭华、范都夫则是全然不同的一代;而应物兄的老师辈,乔木、何为、姚鼐、张子房四位先生以及双林院士,又是别一种风骨了。如果从姚鼐先生的转述上溯至他的老师闻一多,我们甚至可以在《应物兄》当中看到整个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谱系。而李洱的历史爬梳还要更为复杂,他甚至写出了历史长河的不同支流。尽管小说以应物兄为叙事主线,但对其他代际的知识分子,也并非蜻蜓点水,聊作轮廓而已。

《应物兄》为我们提供了太多值得言说的话题。譬如“应物”二字的多重内蕴,譬如他以知识为小说叙述方式的精湛技巧,譬如那个第三人称在哲学与叙事学中的意义……但或许作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更长的篇幅也无法穷尽对它的讨论。如同那些已经被拿来与之参照的经典作品一样,《应物兄》一定会在很多年之后,仍被人们反复提起,并从中发现新的秘密。

# 有情的百科全书式叙事

■丛治辰

能够在一部全景式书写当下现实的小说中营造出如此厚重的历史感,源自于作家审慎认真的态度。和诸多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不同,《应物兄》本质而言不是轻浮、戏谑和油滑的,甚至没有一点沾沾自喜;相反,它有一种沉痛的深情。作为一部学院小说,《应物兄》的叙述相当理性,有着不动声色的客观,也包含了庞杂渊博的知识,反思与隐喻更是俯拾皆是。但李洱并未媚俗地矮化知识分子的形象,小说最重要的反思主体应物兄,始终认真地对待世界、历史和自己。他游走在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却努力寻找着“应无常物,执有常道”的办法。而正是在有常与无常之间,在人的有限性悲剧之中,抒情产生了。而当我们谈到那些有关1980年代历史的回忆,又会清楚地看到应物兄的脸庞上分明带有李洱本人的轮廓。《应物兄》之所以能够如此认真与深情,正因为李洱从未让写作的理性彻底支配,他从未觉得自己超越了写作的对象。相反,毋宁说李洱是通过这样漫长的写作重新理解自己,理解自己那一代人的历史和命运。为此他必须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和他所创造的应物兄,应物兄和他所研究的大儒合而为一了。

《应物兄》为我们提供了太多值得言说的话题。譬如“应物”二字的多重内蕴,譬如他以知识为小说叙述方式的精湛技巧,譬如那个第三人称在哲学与叙事学中的意义……但或许作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更长的篇幅也无法穷尽对它的讨论。如同那些已经被拿来与之参照的经典作品一样,《应物兄》一定会在很多年之后,仍被人们反复提起,并从中发现新的秘密。

# 突破模式化的藩篱

■俞 胜

读者展现了一幅幅别样的人生“风景”,也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愉悦。这部小说将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本质以富于生活烟火气息的方式展现出来,以个人化的视角回应了宏大的社会命题。

王秀梅的《蓝先生》(《中国作家》2013年长篇小说增刊),是通过外祖母的叙述和个人的联想,把一个抗战故事剥茧抽丝般地打开,其间穿插浓浓的亲情和爱情故事,使得文本丰厚饱满。小说标题中的“蓝先生”到底是谁,到结尾部分才闪亮登场。谜底揭开,其实是一只信鸽,这只信鸽把敌人的动向从敌人的巢穴中带给抗日武装。作家非常善于设置悬念,小说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中呈现出构思的巧妙和语言的精致。

在小说的结构上,上述两部作品都采用了现实和历史相互交织的“复线结构”。作家一般采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叙述视角,如《求生再见》的一个叙述视角是“我爹”,另一个是“我”。《蓝先生》的一个叙述视角是奶奶,另一个是“我”。“我爹”和奶奶的叙述属于历史,“我”的叙述属于现实。情节的不断跳转,可以避免冗长沉闷,但是运用得不好也容易给人带来眼花缭乱的之感。

范稳的《重庆之眼》(《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是一部比较圆熟的长篇小说。“大题材、小视角”,小说通过个人命运的跌宕折射出“家国”情怀。《重庆之眼》透过战争的硝烟,直面历史遗留的问题,尤其是对法律程序展开了细致叙述,揭示出了当下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复杂心态。以往的抗战题材小说几乎很少触及这个领域,作家通过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辨,拓展并深化了抗战题材小说的思想内涵。

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人,或者所有的士兵》(《中国作家》2018年第11期、12期),在写作手法上采取一种“圆形套环”结构。一位日军战俘营的幸存者郁漱石,战后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各方的证人证言,包括郁漱石自己的辩词成为一个个“套环”。多重视角使得小说得以立体、全方位地展现了那场战争的残酷和惨烈。小说还通过郁漱石在战俘营里与一位日本学者的多次交谈,探讨了人性在战争中的异化等问题。小说在叙事视角和结构上的突破和匠心,使得新鲜思想和主题得以生长。

突破模式化的藩篱,在艺术手法上求新,在思想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发力,是抗战题材小说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 锐视点

探研本质,开启新知

抗战题材小说在当代文学中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但就像近年来饱受诟病的“抗战神剧”一样,其同质化现象也比较严重。艺术手法的雷同以及思想内涵的单一使得抗战题材小说往往“千人一面”,在低水平徘徊。

在我看来,近年来有几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比较值得言说,如何顿的《求生再见》、王秀梅的《蓝先生》、范稳的《重庆之眼》、邓一光的《人,或者所有的士兵》。这几部长篇小说之所以受到文坛的关注和好评,恰恰是在艺术手法和思想内涵上都有新的创造和发现。

何顿的《求生再见》(《中国作家》2013年第7、8期)在叙事时间安排上比较特别。作者为了集中叙事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按照何顿的说法,“发生在前面的事情也许会放在后面,发生在后面的事情因为需要,又放在了中间或前面。”

小说中的“我”是一位小老板,父亲则是当年参加过抗战的黄抗日。故事是通过“我爹”的回忆,以及“我”帮助“我爹”回忆渐渐展开。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以往的同类型题材作品中很少见。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的“我爹”以独特的视角为

